

松江长虹

——袁珍杀敌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多门师团为主力的万余日寇军队，以走狗张海鹏的降军八千人为前驱，上空有几十架飞机掩护着，从长春大举北进。日伪军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占据哈尔滨的反日吉林自卫军。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哈尔滨市委紧张地向市民进行着反日救国宣传，并在已经组织起来的反日会员里募捐、动员参战，号召保卫哈尔滨，支援正在松花江右岸双城县一带作战的自卫军。

可惜，深受南京蒋介石政府不抵抗和投降政策影响的自卫军首脑们，各有私图，动摇不定，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军队团结、军民联合的主张，没有很好地利用激昂的士气，反而去抑制它。因此出现民族叛徒张景惠敢于公开卖国投敌，使为数十余万人的吉林自卫军前线作战部队崩溃下来，纷纷退走。北满的中心——哈尔滨市也被放弃了。

人人仇恨的太阳旗，插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头顶钢盔，枪上刺刀的日寇兵，到处耀武扬威，横冲直闯。日本宪兵带着“巡警狗”，白天黑夜挨家挨户的搜查，群众一言不

顺就饱受其毒打。青年妇女遭到调戏污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成为被特别追查迫害的对象；敲诈勒索，抢夺居民的财物，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在街上遇见日寇兵的时候，必须立正道旁，鞠躬致敬，朗诵：“太君大大的辛苦了！”如果你面带愁容或横眉冷眼的话，那么你定会受到一顿拳打脚踢！

三月一日清晨，青年工人袁珍，从江北淞浦镇家出来，去哈尔滨市区马家沟他叔父袁品富家。半路上，在道里花园遇上开庆祝“满洲国建立大会”。

会场上七零八落有气无力地正在喊着：“大满洲国执政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等口号。人们被强令“静肃直立，遥拜日本天皇，致敬感恩！”有很多人，忍耐不住，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淌；有的人咬牙切齿要往外跑，却被“巡警狗”挡住……

自从哈尔滨被日寇占领后，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亡国耻辱事，都深深地刺痛了袁珍的心。

袁珍的父亲是辽阳人，一九二〇年间在抚顺煤矿铁道当技工。母亲曾在沈阳纺纱厂做过工。父亲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因得罪了日本监工，而被开除。为了寻找职业，父亲和母亲带着童年的袁珍来到了哈尔滨。父亲在江北中东铁路淞浦站当车辆检修工，母亲在纸烟厂做工。

袁珍满十七岁时正在中学二年级读书，因为家境不好无力再继续读下去，就中途辍学去哈尔滨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当了徒工。他壮实魁梧，聪明好学，工厂里的工人们都很喜欢他。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九一

八”事变前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机车修理厂里有个老技工袁品富，同袁珍的父亲同姓不同宗，两人感情亲密，结为义兄弟。袁珍便把袁品富当做自己的亲叔叔。

袁品富的隔壁住着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工作者绍元同志^①，一天晚上，他正在草拟“如何实现东北人民武装反日”的讨论提纲，突然从袁品富屋里传来激愤的语调声。

“不行！我非走不可，这样亡国奴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啦！”

绍元一听，知道这是袁珍的声音，又听袁品富说：“你别着急，惊动了隔壁那位先生是不好的，半夜三更，吵吵嚷嚷，弄出差头，被鬼子把咱们逮去，那就吃不消了。”袁品富解释地说，“既然你父亲赞成你走，我是不会不同意的，不过你是一个青年团员，行动要有组织，何况反日救国是一件艰苦复杂的事情，必须多方商量妥当才行，但凭一股子牛劲，就以为称心如意，那是不成的……”

袁珍不等叔叔说完，抢着说：“横竖我一定要离开哈尔滨，我们团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今早到江北去找我谈话，要在我们的地下工人义勇军分队里挑选四个得力小伙，准备派到军队去扛枪打日本，我真高兴极了！但是，区负责人说我是江北‘青工’的组长，又是地下义勇军队长，不能把我调走，我真火了，不管怎的，叔叔得帮我想办法。我若能扛上

^① 绍元即周保中同志。

枪，包管勇敢杀敌，替民族出气，把日本鬼子打跑，收复国土。”

“党组织不直接管青年团的工作，但我可以把你的志愿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提一提，也许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绍元在隔壁屋子佯装熟睡，叔侄俩人的对话，全被他听清了，心想：象这样优秀的青年为什么不派他到军队中去呢？若派去，一定会起作用的。

刚天亮，袁珍起床，生火煮饭。

早饭后，袁品富就要走了，袁珍一再嘱咐叔叔：“千万别忘记，三天后，我来听回信。”

“你走吧，年轻人唠叨啥！我得先走，要赶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呢。”

袁品富走后，袁珍收拾好屋子，将秘密文件放进半麻袋玉米面里，扛在肩上，腋下挟着“滑板”和拄棍，锁好房门，便离开了。到了江岸，他踏上“滑板”，在江面的冰道上飞快地往江北岸滑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傍晚，青年团区委会的领导人来到了袁珍家里，“你请求参军，离开哈尔滨，这个志愿虽然值得重视，但是按地下工作需要，区里决定是不能把你调走的。”

袁珍睁圆了明亮的眼睛，漆黑的两道粗眉毛挤上挤下，很不自然地回答：

“嗯，就这样办吧，别看我想不通，为了革命，我什么

都能同意的。”

区委会的同志，紧紧地握着袁珍的手，满意地离开了。

日军趁着冰冻有利于野战行动的季节，沿松花江右岸和哈尔滨以东地区，分两路向自卫军进行新的进攻。

三月二十日的夜半，袁珍正在酣睡，父亲急促地把他摇醒。他惊诧地问：“啥事？爸爸。”

“区里来人找你谈话。”父亲点亮一只小蜡烛。

在闪烁的烛光下，袁珍看清是团区委书记在进门的左侧壁炉旁坐着，脸冻得通红，两手不断地揉搓，吸着烟。

袁珍急着问：“同志！有啥重要事，半夜三更，顶着寒风过江来呀？”

区委书记不说正题，继续抽着烟。

“到底啥事？”袁珍更急了。

“团省委已经决定：派另外同志接替你现在的工作，要你离开哈尔滨，明天就去通知那四个早已准备要调动的同志，分成两组，后天午前一定到江南，你自己一个人到你叔叔袁品富那里，他会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并且有交通员安排你的旅途。”区委书记转过身来问袁珍的父亲：“你看，袁珍是不是可以离开？”

“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商量妥就行。”

区委书记向袁珍说明了这次要派遣他去执行任务的简单内容和重要意义，并慎重地嘱咐：

“虽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但如果你认为有啥困难或者不能去的话，还是可以商量的。”

“既然组织决定，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何况我个人早就有这个愿望呢。”袁珍坚定地说。

区委书记高兴了，拍着袁珍的肩膀，又叮咛了一番。

袁珍的父亲送走了区委书记，感到屋里有点冷。他打开壁炉门，在残余的炭火里添上几块木柴，顺手移过一只小矮凳，坐在炉边抽起烟来。一会儿，壁炉里熊熊的火光照射着小屋。父子俩人都好象忘记了睡觉，默默地对坐着，谁也不做声。袁珍忍耐不住了，向低头沉思的父亲说：

“爸爸，我以为要离开哈尔滨是不会有希望的，可是今晚得到这个好消息，真高兴极了！您为什么不吭气，难道后悔了么？”

“不，一点也不后悔，我一直愿意你远走高飞。”父亲忽然精神抖擞地站起来，用烟袋指划着说：

“救国是大事，鬼子侵占我们祖国的大地，要把我们同胞当牛马奴隶使唤，这是经过了好多年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如果不是地主、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欺压老百姓，如果不是买办大资本家卑鄙倒灶，献媚外国强盗，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投降，不卖国，那么日本鬼子也不敢这样大胆地侵占我们祖国土地，祸害我们同胞。”他的语气越来越沉重，“孩子，我高兴你离开家。莫说你们青年小伙，就连我，在心里也时常盘算着说不定那一天，即使手里抓不到枪，也得抡起斧头、铁棍同敌人拚斗一场。”他的话停了一下，“孩子，你就收拾收拾离开哈尔滨吧！可就有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袁珍的父亲沉默了。

袁珍不解地问：

“啥事？”

“前年给你订婚的时候，你总是埋怨我和你妈妈，说我们是老封建，包办婚姻，男女双方都不愿意，硬要退婚，如果那时退了婚，现在不就好了吗？但是从去年年底，你和桂贞难分难舍，厂里的男女工都当笑话传。现在你走了，她能安静地呆下去吗？”

“您不知道我和桂贞为什么起了变化，我没有告诉您。去年十月鬼子打到嫩江桥的时候，‘老巴夺’烟厂开会支援抗日，桂贞被厂里青年女工选为职工会的代表，在区里讨论青年工作活动的时候，我和她常常碰到一块，说也奇怪，从那时起我俩闹离婚的恶感一点也没有了，感情反而亲密起来。有一次区委的一位同志向我俩开玩笑：‘反日战友的钢绳子把小两口绑在一起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找桂贞当面说说，写一封信，请您交给她。桂贞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她是厂里妇女反日会的活动分子，因为她是品德又有本事，我深信桂贞是能够踏踏实实地站稳脚步的，请爸爸不必有什么顾虑。”

袁珍的父亲幽默的说：“哦，原来如此，既是这样我和你母亲就放心了。我这个封建佬，从前是包办婚姻的穿针引线人，现在成了你们革命夫妻的传书递信人了。”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懂得怎样去处理个人的事情。”袁珍羞涩地说。

的确，袁珍家里在一夜间，出现了慈和爱，忧虑和激动，轻松和愉快的各种感情。

隔了一天，袁珍按预定时间到达江南他叔叔家里，接受

了地下党负责人给的行动指示，乘坐东开的火车离开了哈尔滨。

三月下旬，向东进攻的日寇，好象执行预定的军事演习实施计划一样，以走狗军于深激部队为前驱，而日军的主力紧跟在后面，压迫着宾县、延寿一带；另一路寇军沿着中东铁路东线阿城、珠河前进。在战区的某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枪声和炮声，天空中的敌机盲目地到处轰炸。吉林的自卫军与敌人稍一接触就向后退。广大地区的居民却遭到侵略战争的灾殃。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在反日军队中创造反日武装的核心力量，在自卫军里一个要求走彻底抗日的革命路线的步兵团，是着手工作的对象。省军委书记绍元同志，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前往哈尔滨以东地区进行活动。

绍元到达珠河县以后，看见从车站到县城都是日寇军队，势态显得很紧张。地下党委把当地的一些情况通知了他，他即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袁珍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到珠河下车的。地下交通员引他到车站后面一家大车店住下，他已乔装为苦力工人的模样，在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他肩上搭着两条麻袋腰上围绕着一根粗麻绳，在大车店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懒洋洋地走着，手里攥着一个苞米面窝窝头，边走边啃，眼睛不住的东张西望。突然对面来了一个熟识的人，他不由自主地惊慌起来，停住脚步，心里想：为什么住在哈尔滨他叔叔袁品富隔壁的那个可疑的教书先生在这里出现了呢？袁珍心里正

在继续思索，但是那个熟识的人表示出很平淡的样子向他打招呼：

“张老师今天没什么好活干吗？天已晚了，还是回到咱们堆栈里去吧！”

袁珍一愣，这是规定的接头暗语，但他立刻心里醒悟似的平静下来，回答说：

“好吧，就到你们堆栈去吧！”

袁珍跟在绍元后面向北小道街走去。夕阳在他俩前面极远的方向渐渐地下垂到地平线上，远近的村落缭绕着炊烟，从遥远的珠河县街和它周围的村镇传来马的嘶叫声，群犬的狂吠声，在人声嘈杂里有尖声，嚎啕声，看光景这又是侵略者的军队宿营引起的骚扰。绍元引袁珍走到一片谷地里，望了一会儿星星点点各自独立的农户，然后他俩象被邀请的熟客一样，一直向一家朝鲜族农民家走去。女主人操着流利的汉语欢迎客人进屋。他俩分坐在小炕桌的两旁。女主人热情地向客人问候，并且把早有准备的一大木盆热气腾腾的苞米楂饭端到炕桌上，拿过两个大铜碗和铜匙子摆在客人面前，接着就是一土瓷盘满盛着大葱煎鸡蛋，堆尖的一大碗腌辣白菜，又一大铜碗白开水汤——摆满了桌子。女主人慰劳似地请客人用饭。

袁珍边吃边说：

“说真的，你虽然是我的老熟人，在哈尔滨我就不相信你是什么南蛮子草药医生或教书匠，我怀疑你是日本鬼子的侦探，你的真实情况我叔叔从来不肯向我透露，因此今天在珠河车站碰见你的时候，使我十分诧异，我判断你一定是日

本鬼子的狗腿子，盯梢跟我到珠河来的，我当时心里盘算把你揍死再脱逃呢？还是不理睬你，赶快脱身为妙？主意还没有打定，忽然你用规定的暗语向我打招呼，我仍然有怀疑，但我不能不大胆地答话……”

“你什么时候到珠河？看到些什么？”绍元问道。

“昨天上午十点钟到珠河下车，住在一家大车店，听说日军主力和于大头的走狗军往延寿和方正开去了，后续部队昨晚和今天还有到来的，这次寇军决心要追上自卫军，把他们通通消灭……”

绍元吸着烟，倾听袁珍激动的叙述。

“昨天下午，差点儿出了乱子。”

绍元急问：“出了什么乱子？”

“昨天午前交通员送我到车店住下，觉得大白天蹲在店里没事干，反会引起坏人的注意，因此决定到街上走走，看看光景。当我路过十字街口的时候，那里聚集着一大堆人，看样子又是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欢迎日本皇军大会’，会场上人们虽然手持各种颜色的小旗在摇晃着，但表情是十分冷淡的，有几个日本军官和‘维持会’的士绅在台上轮流讲话，会场周围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巡警狗’把守着。鬼子军官讲完话，几个鬼子和‘巡警狗’搬出了几只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从里面拿出很多糖果，还有针、线、一盒一盒饼干、小纸本、铅笔……向参加大会的群众挨个分发。据翻译宣布说：这是大日本天皇所赐‘日满协和’的赠礼。我也得到一条小手巾和一支铅笔。正在要散会的时候，县街南头突然‘砰、砰、砰’发出几排枪声，人们惶恐地向四面八

方乱跑开了。枪声很快就不再响了，街上呈现出一片静寂，除了日寇兵来往走动以外，居民几乎没有行走的。

“与其说我为好奇心驱使，不如说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就大着胆子往南街走去，希望能在枪响的方向看到些什么。当我走到距离南街口外数十步远的地方，蓦然发现鲜血淋漓染满全身的两具男尸横在道旁，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尸体附近走来走去。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在用脚不断地踢那两具死尸，好象踢皮球一样，并且做着鬼脸向其他的日本兵开玩笑。四个‘巡警狗’分做两组站立在尸体南北方向，好象在封锁行人的样子。我当时料定这两个死者一定是刚才枪响时被日寇残杀的，我立刻觉出自己的脸、手发烧，心头涌起愤慨的火，但是我暗自吸了一口气，正想转身照来路往回走的时候，头顶‘哧溜’一声飞过一颗子弹，是一个日寇兵向我开了一枪，接着几个日本兵唧哩哇啦叫嚷着向我追来。我拔腿就跑，钻了好几条小巷，一口气跑出了东城外，背后没啥动静，我才放慢了脚步。”

绍元听得入神便插问：

“你后来往哪里去了呢？”

“因为地方生疏，没有个另外的落脚处，天色又已经傍晚，我寻找方向，又回到大车店住下。店客拥挤，大家唧唧喳喳在谈论今天珠河街发生的事情，有的用叹息的语调，有的人表现出愤怒的心情。靠近我的铺位的一位长者，回答了我的问话，我才明白，被日寇打死的那两个居民，其中一人姓王，是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前曾经揭露过在珠河开当铺的日本人小林如何重利盘剥，如何仗势欺压居民，并同小林

打过架，他怀恨在心。现在日本军来了，他气焰嚣张，到日寇军宪兵部队诬告姓王的是当地仇日派领头人，因此姓王的就被日寇宪兵抓住枪毙了示众；另一个被害的是一个小学教师，曾经在姓王的被捕以后，到‘维持会’要求士绅们去保释他。小学教师义正辞严的责备‘维持会’，不是维持中国人的生活秩序，而是维持日本侵略者对人民横施蹂躏的秩序。就这样，小学教师也被日寇宪兵抓去，同姓王的一块枪毙了。自从出了这件事，全县居民心里都愤愤不平，但谁也不敢多嘴多舌……”说到这里，袁珍气愤地攥紧拳头往小桌子上狠狠一砸：“说真的，当我看到两个死者的惨状和鬼子兵象畜生样儿的时候，我真想同日本鬼子拚命算了，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命令自己忍气吞声向后转走了，我的脑顶上竟因此飞过来一颗子弹，假使枪口稍稍低一点的话，不正把我的脑瓜盖揭开了么？那不就白白送死了吗？”袁珍睁圆了眼睛又补充了一句：“真气死人！”

绍元弹去烟头上的灰，仿佛讲演似地向袁珍说：“同志，你何必上火，为革命牺牲这是必不可少的，但要看死得是否价值。你不能拿一把削铁如泥的降魔宝剑，去乱砍你路上遇到的顽石。你的大胆勇敢，而又机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是为同志们所重视的；你虽然没有进过大学堂的门，但你写的工作报告和宣传单是那样的通俗明了，生动活泼，有很好的革命文气。然而你有缺点，你象梁山泊好汉李逵一样，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就抡起板斧乱砍一顿，这对于革命的地下工作是不好的。张飞什么时候粗中有细，什么时候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使性子“暴虎冯河”，就坏了事，连脑袋都

搬了家。”

袁珍把刚才的激动心情转为沉静，注意倾听绍元继续说下去。

“看光景，自卫军是不会有有什么认真的抵抗，日寇军将继续东追，这就造成我们要达到的工作目的，将有很多困难。你作为工作小组长，要使用你的聪明和机警，在情况复杂里考虑自己的行动，千万别忘记：混杂在敌军作战行动地带，进行我们的工作活动，是带有危险性的，一切必须估量到可能碰到的危险，也就是要在不可避免地出现危险的时候，必须能够脱离危险。”

谈话兴趣正浓的时候，女主人同着一位珠河地下党负责人走进屋来。女主人从炕头搬出两床破旧的棉被给客人铺在炕上，向客人说了声明天见，就出门往隔壁屋去了。地下党的同志向绍元介绍了情况和商讨了工作。不久，便告辞走了。

绍元再一次向袁珍说明，这次要到自卫军去的具体任务：将在自卫军的一个步兵团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组织，在全国范围展开军队革命化，实现彻底反日的活动。袁珍是这个核心组织成员之一。他们商量了当前的一些行动计划，快到半夜就都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女主人从隔壁屋把准备好的早餐送过来。袁珍和绍元吃过早饭，化装为小商贩的模样，离开了朝鲜族农民的小村，奔向大道，混杂到日寇行军纵队后尾，跟随着民间运输大队向延寿去了。他们傍晚便到达了延寿县城。那里寇军活动频繁，居民秩序混乱，谣言多，人心惶惶

不安。根据可靠的消息判明：日寇原来打算把自卫军主力压缩到方正及其以东松花江右岸狭长地区，然后加以歼灭。但是，自卫军在敌人未到时放弃了延寿和方正一带的抵抗线，继续顺江右岸向东退走，敌人急速地向东追击。在珠河一带集结待机的日军，也沿着中东路向东进击。看样子寇军的目的是要占领松花江右岸的依兰县和中东铁路东线的牡丹江市——南北呼应，组成沿牡丹江通到松花江的一条战线。后来的情况发展证实，就是这样的。

事情出乎意外，中共满洲省委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求绍元赶回哈尔滨。因此，绍元紧缩在自卫军中的工作活动范围，指派了袁珍坚持执行东去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在自卫军中，找到做工作对象的部队去开展活动。

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绍元带着一个从比利时回国不久的留学生，和一个皮鞋工人返回哈尔滨去了。袁珍感到接受独立工作的事情是很突然的，但他并不着慌，并不犹豫，和同组行动的另外三个同志商量了行动计划。他们分成两组，冒着满天弥漫的大雪，顶着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刺痛肌骨的狂风，迈向目的地——依兰地区去了。

袁珍和他的同志在寇军前进部队和运输队的间空里穿插着走，有时必须避开大路另寻小路绕越行进，有时必须夜间行走。饮食住宿失常，疲乏和紧张交错着。这样旅途的艰苦，袁珍虽然未曾经受过，但他好象一个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老战士一样，艰难、困苦、危险并没有使他低头，他的精神仍然是饱满的、愉快的。一到远离大道不为敌人注意的地方，他就低唱着流行的歌：

黑水、长白是祖国壮丽的河山，
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三千万，
那能忍受倭贼侵袭摧残！
大家起来斗争，救国保家乡。

……

经过四天多的曲折复杂的行程，袁珍和同伴到了松花江右岸、大罗勒密附近，和同组的同志们接头，并在那里打听消息。据说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到依兰江西岸，袁珍估量日军占领依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顺着敌军前进的大路去依兰寻找工作对象的自卫军部队，结果会是白费，不如舍弃大道，改走江道，赶过敌人先头部队，绕往自卫军的后方，这样就可以绕越敌人警戒线；同时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依兰以东，接近工作活动的目标。

袁珍和同伴往西走了三十多里，到了江岸小镇德莫力附近，得到地下“反日会”的帮助，坐上为他们准备的爬犁出发了。

大雪纷飞，风的狂吼在夜间显得分外凶猛。气温骤然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马不停地奔跑，汗水如注，皮毛光滑的身躯冻结着串串冰柱，宛如琉璃珠子，挂满了全身。冰串相互撞击，发出细碎的叮铃当啷的响声。他们倾倒歪斜地挤坐在爬犁上。

约七、八个钟头，走了一百五六十里的途程。东方出现微白，驭手用长鞭遥指着十里左右的地方，小声说：

“那就是依兰县街，在我们右侧江岸前面鸡叫狗咬的那

个村子，就是牡丹江西岸的马家大屯了。”

袁珍心里发生惊异：为什么战争中心地区，昨天下午还可以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大炮轰鸣，和飞机扔炸弹声，而现在却是这样沉寂？难道敌人已经占领了依兰重镇，自卫军又退走了吗？既然如此，也得越过依兰深入到后方去。袁珍知道这是旅途的重要关头，不能松懈。他向驭手和同志们说：“我们必须再紧赶一段路程，越过依兰以后，再找地方打尖（吃饭）。”大家非常赞同，振作起精神，继续赶路。

忽然江右岸响起几排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驾爬犁的辕马被打倒了，拉套的马也摔倒在地，爬犁翻了。驭手急忙卸下被打死的辕马，狠狠抽打另一匹马。马拉着翻过去的爬犁，刚刚跑几步，突然，第二阵排枪响了，两颗飞弹击中了袁珍的右腿，只听“咚”的一声，袁珍从爬犁上跌下来。接着，马又中弹倒在地上。大家惶恐地向袁珍围来，其中一个同志撕下一块包袱布给袁珍包扎流血不止的大腿。他们搀扶着袁珍向江北拼命奔跑。这时天已大亮，十几个双手持枪的日本兵，包围过来。袁珍清楚地知道，虽然伤了不是致命的地方，但若脱逃是困难的。他不忍心同志们为救助他而被拖累，以至完全落入敌人魔掌。他拒绝搀扶，告诉副组长带一个同志去执行任务，另一个同志同着驭手反回方正，向哈尔滨联络站报信。他竭力地推开同志们，命令他们分头逃跑。袁珍跑了几步，摔倒在地。这时敌人上来了。

十多个寇兵不去追逐分头逃跑的四个同志，而把他一个人团团围住，嘴里唧唧咕咕问话，用枪托和拳脚踢打着他。

这时的袁珍现出安然无事的樣子，好象一块钢铁的砧

子，任凭寇兵捶打。

日军带着胜利的骄傲，象豺狼一样，连拖带拉把袁珍押到马家大屯去了。

日寇认为袁珍现在是他们重要虏获物，将从他的身上得到“理想”的东西。宪兵严刑讯问，袁珍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无住所的小商贩。日寇逼迫他说出同行的人们的来历和去向，他严词拒绝招供，推说和他们素不相识，只是在途中搭载偶然碰上的旅客。日寇部队长大发雷霆，拳打脚踢，并吩咐鬼子兵卒向袁珍鼻孔里倒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和背，用木杠压他的两肩和两条腿。袁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不省人事，昏厥在地。

当袁珍被凉水浇泼苏醒过来的时候，一个宪兵少尉，离开座位，亲自扶起袁珍，给他解去捆绑的绳索，要他倚靠着墙壁坐在一块板上，接着用生硬的中国话和蔼地说：

“你的同伙的四个人，跑脱一个，三个人通通的被抓住了。你说实话吧。哦，是不是肚子饿了想吃饭？”

袁珍点点头：“嗯，吃点东西再说。”

少尉叫一个兵卒端过一大碗用开水冲开的麦片粥。袁珍接过来，很快就把他吃完，向那个少尉说：

“大大的谢谢！”

少尉微笑了。

袁珍早就识破少尉的奸险，他心里想：四个同志可能脱险了，即使有人被抓住，也不会叛卖祖国，向日寇低头，万一真的有人被捕变节，也不能动摇我自己的革命贞操。袁珍在暗笑宪兵少尉愚蠢的诡计。

“是时候了，照直说吧，大日本皇军是来帮助满洲建国的，黄种人自强是我们神圣的任务，大鼻子红党，中国赤匪，我们统统的反对。日满协和，太平日子就有的，你要说实话，好处大大的有——快说！”日本宪兵少尉指手画脚，象训话般地向袁珍说了一大堆。

袁珍带着十分疲困的神情，喘息着向少尉回答：

“我愿意都说出来，但是伤口十分疼痛，稍稍歇息一会儿才好。”

“好吧，就让你歇歇，你生翅膀也飞不了的！”少尉说着用手一指，叫两个宪兵把袁珍带到东厢房的一间小屋。马上来了两个哨兵，一个在门外，一个在后窗监视着。

袁珍料到事情已经陷入绝境了，总得设法寻找机会逃脱。快到中午的时候，袁珍虽然不能往外瞻望，但听到不远的大道上发出大批军队向东行进的沉重的脚步声，夹杂着炮车、汽车、大车的隆隆声。袁珍认为依兰已经失守，心里有些难过。散驻在这里的日本宪兵，虽然动作并不紧张，但已在作移动准备。袁珍心里着急，虽然自己的腿负伤两处，但未伤筋动骨，还可以跳跃奔跑。他正打算冒着最大的危险从后窗逃跑，突然一个宪兵军曹闪进屋来，手里拿着绳索和手铐要给袁珍上刑，袁珍央求着说：

“你们不是叫我要说老实话吗？请你去禀报太君，我现在就说。”

军曹让两个哨兵把袁珍架到上屋。

宪兵少尉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袁珍一跨进门，他就声色俱厉地说：

“再没有时间拖延了，若不说实话，归顺满洲国，报效大日本皇军，就要砍掉你的脑袋！”

“一个破产失业的小商贩，要到富锦去投亲靠友找活干，这是已说过的实话……”袁珍睁圆了眼睛大声地回答。

“八嘎，胡说！”少尉跳下炕，一拳向袁珍劈面打来，袁珍头一偏躲过去了。少尉如饿狼一般，怪叫几声，指挥手下的人给袁戴上手铐。宪兵军曹在一旁抽出亮晃晃的马刀，袁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便使尽全身力气，从两个哨兵挟持中挣脱出来，飞起左腿，正正地踢到军曹的右腕上。军曹手一松，马刀落地。袁珍抢夺到手，猛地一刀劈去，少尉的脑瓜盖削去了大半边，登时倒地死了。七、八个日本宪兵慌做一团，用枪刺和马刀向袁珍乱砍，都被袁珍搪过。小小的屋子变为激烈的战场。

袁珍从小就跟父亲学过少林寺派的拳脚棍棒，使刀弄叉，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大显身手。宪兵军曹也被劈死了，其他的几个宪兵有的被削去一只手，有的负了轻重不同的伤。日本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大大丢了魂。最后从另一个小院落跑来两个宪兵军曹，用手枪连发十数响，将袁珍打倒，但是袁珍的两眼发出炯炯的光亮，呼吸还没有停止。

日寇宪兵抓来村里的六个农民，强迫他们卸下一扇门板，要他们带上大锄头、鹤嘴镐。袁珍被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日寇从大屯调来一排人，在前面开道，农民抬着门板上的袁珍横穿大道向松花江走去，一群宪兵象送丧一样的跟在后面。

袁珍的头、脸、全身染满了鲜血，他张开嘴唇想要说

话，但被勒紧的脖颈发不出噪音。他心里很明白，他将离开亲爱的祖国，自信自己的血不会白流的，所可惜的是过早的牺牲，没有给祖国河山收复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样的表情是抬着他的农民们从他微微转动着的眼神和平静地呼吸里看出来的。

袁珍被抬到离开小屯三、四里的江心，日寇指挥农民把门板放下来，要农民动手在冻得厚度几乎有一公尺的江面上凿开一个大窟窿，下面水流湍急不断往上涌出，这时在门板上捆着的袁珍突然从沙哑的嗓子里高喊：

“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胜利！”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袁珍的行动，引起敌人的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似乎在默默赞佩，有的发出狗吠狼嚎的仇恨声。

一个身躯粗大、形态丑恶的宪兵举起锋利的马刀，对准袁珍的脖颈砍去。英雄的头颅飞离了躯体，满腔的鲜血，溅注着松花江的冰流……

几个鬼子宪兵将袁珍的尸体连门板一块儿推入冰窟窿里去。英雄的头颅被宪兵用两条重叠着的麻袋包裹起来，带到上司那里去请功。以后，悬挂在依兰市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

被迫参与埋葬袁珍的农民，为英雄的气概深深感动，他们仇恨寇兵的残暴，他们忍受着痛心的眼泪，回到村里，把烈士慷慨就义的经过遍告深受苦难的同胞们。

松花江上年年出现的长虹，是烈士爱国捐躯的光荣的伟大的象征。不到两年的光景，在松花江两岸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游击战争。爱国的工、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踏着烈士的血迹，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一九五八年